

异地养老：问题与前景

陈友华

内容提要 本文在回顾异地养老在中国提出的背景与诉求的基础上,对异地养老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异地养老在中国具有市场性、小众性、或然性、风险性四大特性,并遭遇收入限制、老年特点、民族特性、医保难题、资源匹配困难五大问题困扰。目前,低龄、健康、有经济支付能力、喜好旅游的老年人是异地养老的潜在群体,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阳光地带更可能成为异地养老的理想之地,养老机构与租房是异地养老的主要选择。最后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

关键词 异地养老 特点 影响因素

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10046

一、引言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及其相关话题已逐渐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人们探讨各种类型的养老方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其中,也包括异地养老问题。在西方,异地养老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体系,但在中国,异地养老的提出距今仅有10多年时间。2004年8月17日,首届全国养老机构院长高级论坛暨全国异地养老推介大会在大连市社会福利院召开,异地养老作为一个新名词被提出(阎萍,2006)。

自异地养老概念在中国提出至今,政府虽努力推动,在海南等极少数地区也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整体而言,异地养老在中国至今仍没有被推广开来。异地养老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制约异地养老发展的因素有哪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给予明确的回答,从而给乱象丛生的中国异地养老发展指明方向。这是学界的责任,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本文将以前述异地养老问题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初步的尝试研究,并试图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项目批准号:71173100)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AZD025)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异地养老：概念、特点及其基本问题

1. 概念

异地养老是指老年人离开现有住宅,到外地居住的一种养老方式,其实质是“移地”养老,即养老地点的改变。有学者根据养老目的的不同将异地养老划分为“生活享受型”、“投靠子女型”、“子女吸引型”和“机构移居型”等不同类别,并对这四类异地养老人员的养老问题进行了系统概括(王树新,2006)。实际上,按照不同的维度,还可以把异地养老划分为其他不同的类型。例如,可以划分为旅游养老、度假养老、回原籍养老等(袁开国等,2013),也可以划分为候鸟式安居型、旅游观光型、休闲度假型、探亲交友型四类,以及迁居和暂居两类。

在西方,因公民可享有自由迁徙权,因而一国范围内较少出现异地养老现象,较多出现的是老年迁徙。异地养老多是跨国行为,例如,北欧人冬天去南欧避寒。而在中国,异地养老部分是制度性隔离的产物,特别是投靠子女的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与便于讨论,如无特别说明,下文在讨论异地养老时多把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排除在外)。

2. 特点

(1)市场性。异地养老是建立在较好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客户群是自己或者子女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人,即有闲有钱的中高社会群体老人,满足的是老年群体的发展性需求,因而多不属于政府的基本责任范围。因此,异地养老属于老龄产业的范畴,市场性是异地养老的基本属性。市场是异地养老的建设主体,并基于自愿原则参与,其盈利是市场组织的主要目标。因此,异地养老机构首先具有市场属性,即应按照市场逻辑运营,其次才具有社会属性,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府不能要求作为市场组织的异地养老机构向社会提供福利性的养老产品与养老服务。

(2)小众性。早在1982年美国抽样调查就发现每7个老人中就有将近一个发生移居(Krout,1982)。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具有迁徙的传统,且制度性阻碍因素少。但中国是社会经济政策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度,自由迁徙至今仍受到隔离性制度的重重阻碍,再加上“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有研究显示,中国异地养老最为集中的海南,每年冬季集结的“候鸟老人”约45万人(陈标志、党朝峰,2012)。由于缺少相应的全国性调查统计数据,全国异地养老人数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虽然绝对数可能超过百万,但相对于2亿多的老年人口而言,异地养老发生率极低。因此可以说,异地养老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3)或然性。异地养老属于非基本需求,易受到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某种或然性。老年人口移居的不可预测性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一次性去某个地方的人过多,超出了当地的承受能力,会给当地的公共设施等造成很大的压力。去某个地方的人太少,又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4)风险性。老年人是一个相对脆弱的群体,其迁居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和意外事件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例如,长途跋涉对老年人的身体是个挑战,因迁居所带来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突然改变,对老年人的适应能力也是严峻的考验。对于组织者来说,“异地养老”面临着一定的法律责任风险。老年人到了异地由于水土不服和其他非自然原因发生某些意外时,就存在一个谁来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穆光宗,2010)。因而异地养老存在一定的风险。此外,由于远离原居住地,来自于家庭与原住地的社会支持大大减少,从而对异地养老所在地社会的依赖性增强,故会需要更多的医疗等配套设施与专业服务支持。

3. 基本问题

(1)究竟谁会去异地养老? 异地养老的市场属性决定了异地养老所产生的花费主要由个人或家庭来承担,这就决定了异地养老群体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即只有那些经济上相对宽裕的老年

人或者家庭才是异地养老的潜在客户。现实中选择异地养老的也多为年龄偏低、健康、有支付能力、且喜好旅行、适应能力强的老年人。

(2)什么地方适合异地养老? 异地养老对气候等自然环境有特别的要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风景秀丽的阳光地带更可能成为异地养老的理想之地。有研究显示,除了气候、环境因素外,很多老年人还会考虑医疗水平、服务设施、交通条件等因素。Rodriguez(1998)研究发现,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完善的旅游设施、空间距离的邻近和交通可达性是给旅游者留下良好旅游经历的基础。此外,成年子女的居住地也是影响老年人迁移的重要因素(Litwark & Logino, 1987)。比如,美国的佛罗里达、欧洲的西班牙、中国的海南等都比较适合作为异地养老的首选之地。

(3)会居住在异地什么地方? 选择异地养老的老年人一般会在异地居住较长时间,由于宾馆、饭店、度假村等收费标准较高,在异地购房成本更高,故老年人一般更可能选择收费相对较低的老年公寓、养老院、租住房屋等养老。这样,老年人可以在慢慢享受异地养老所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又不会增加太多的支出(李东、吴定伟,2011)。

(4)异地养老在中国为什么会逐渐兴起? 笔者认为主要是下列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一是中国已逐渐从一个贫穷的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富裕的社会,部分老年人或者子女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异地养老的消费能力,为异地养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二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需求正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养老的思想观念已经并仍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异地养老创造了思想基础。三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加,虽然异地养老是小众产品,但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为中国异地养老的逐步形成创造了人口基础。四是中国的老年人口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年龄低得多,也为异地养老提供了身体基础。五是中国的退休年龄较早,使部分人想出去走走,甚至有异地养老的愿望。六是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中国的老龄产业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异地养老创造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三、中国的异地养老: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1. 制约因素

(1)收入限制。异地养老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以离退休或养老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群体仅占24.12%,生活在城市的老年人仅占26.08%。即便到2015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刚超过2000元/月。总体来看,老年人收入较少与支付能力较差,仍会制约异地养老的发展。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有异地养老的愿望,也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能力。

(2)老年特点。人类生活既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社会环境。同样,异地养老也需要考虑老年人的地理与文化的双重适应性(穆光宗,2010)。比如说人们的生活环境完全可以通过迁移或人为改造去改变它,但社会环境却不能在短期改变,也无法携带而去。也就是说,异地养老的最大优势是自然环境可以充分地自由选择,最大劣势是熟悉的社会环境、“邻里”关系将被打破。此外,由于主客观等多重因素所致,使得许多中国老人表现出不爱读书,又缺少宗教信仰,因此,与西方老年人相比,中国老年人的闲暇生活会显得更孤单与寂寞。诸如,当老人从一个生活多年的熟悉的环境迁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对气候、人文环境、饮食习惯的适应力提出挑战。另外,离开了熟悉的亲人、同事、街坊、朋友,在新的人际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年人会感到特别的孤独。因此,调查发现异地养老的选择者多为年龄偏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而当老人们年事已高,异地养老将可能出现有一种被社会隔离之感,此时,如果老年人的脆弱性和孤独感得不到有效的处置,老年人无法在新的环境中快乐地生活,那么“异地养老”就会受到阻碍(刘伟、陈鹏,2012)。对于高龄、身体欠佳的老年人而言,自然环境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较好的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但目前的情况是受制度性限制,医疗护

理可能在城市、特别是原住地城市才能更好地得以满足。这也是老人们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3)民族特性。中国人历来有“落叶归根”，“离土不离乡”的传统思维定势，加之户籍登记制度及在此基础上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造成城乡与区域隔离，使得中国人对异地的认可度不高。因而才有“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的民族性格。此外，固守“本土”，勤俭节约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这种民族特性也对异地养老需求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

(4)医保难题。老年人是医疗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使得老年人异地就医费用不易报销，这在客观上也阻碍了异地养老的发展。为消除医保难题，有人提出了医养结合。鼓励养老机构办医院，医院办养老机构。但笔者认为这有可能导致：一是医院不像医院，养老院不像养老院，而且可能导致医院与养老院的运行成本都大大增加；二是对医疗、用药管理制度执行不利，如“一人医保，全家吃药”，医疗机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长期困扰中国医改的世纪难题。在此情况下，“医养结合”稍不留意，医保开支将急剧增加，最后成为掏空医保、掏空年轻人、掏空政府财政的工具，为未来制造更多的政府债务负担，并孕育更多的经济社会风险。因此，在推行医养结合的同时，加强监管并防止医保滥用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

(5)资源匹配困难。有学者指出，中国异地养老提出的初衷是养老机构设想以旅游养老为依托，各地养老机构之间相互交换客源，在满足老年人需求，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同时，提高养老机构资源的利用效率，共享资源，共谋发展(阎萍，2006；穆光宗，2010)。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组织者的一厢情愿，实际上难以做到。原因在于：异地养老的老年人在同一时间内多是单方向移动，夏天到北方，冬天去南方，出现所谓的潮汐现象，致使海南等异地养老集中地的夏季人烟稀少，犹如“鬼城”，一到冬季人员暴增，热闹非凡。出现夏季养老资源严重闲置、甚至浪费，而冬季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即异地养老资源很难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2. 产业规模

异地养老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特别是中国的异地养老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有人认为中国的异地养老市场广阔(周刚等，2015)，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情况。虽然美国的研究发现异地养老有较大的市场(Krout, 1982)，但 Warnes(1994)明确指出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管理体制，很难统计到各个时段移居到地中海沿岸的老人及其数量。因此，美国对异地养老市场规模也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正如本文前述的那样，一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国情相差很大，美国异地养老情况不适合中国。另一方面，异地养老在中国仍处在起步阶段，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限制，其产业规模很小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四、相关问题探讨

1. 异地养老增加还是减轻了家庭和国家的养老负担？

有学者认为，异地养老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和国家的养老负担(周刚等，2015)。事实上，异地养老花费一般要高于、甚至远高于本地养老花费。虽然异地养老会出现养老负担的地区间转移，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国际迁移很少的国度，因而异地养老不会出现养老负担的跨国转移，而仅仅出现国内的地区间转移。由此可见，从家庭与国家整体层面上讲，异地养老非但不会减轻家庭和国家的养老负担，更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家庭与国家的养老负担。

2. 是否应建立专门的异地养老社区？

关于建立专门的异地养老社区，从美国等国的经验看来，笔者认为，无论从经济与社会角度审视都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一是异地养老社区的建立，有可能增加对老年人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会疏远甚至失去其他年龄群体，结果反而是得不偿失。二是尽管有老年起点年龄规定，但伴随着人类健

康状况的改善与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已跨入老年门槛的老年人对自己已成为老年人的事实,心理上将经历一个抗拒、默认到接受的过程。进入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社区或机构则是心理上的某种暗示,意味着对进入老年的心理上的默认,因而会遭致部分老年人、尤其是“年轻”老年人的拒绝,即因“不服老”而对老年机构产生本能的抗拒。三是纯老年社区意味着老年人的自我封闭与自我隔离。不仅整个社区因此而暮气沉沉,缺少活力,甚至整个社区还弥漫着来日不多的讯息,本能地也会遭致老年人的抗拒。四是鉴于老年消费市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企业应善于发现老年消费者尚未满足的需求,但同时要避免疏远其他年龄段消费者”(李超,2015)。而中国社区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一再提醒我们:应该倾力打造全龄人群而不是单龄人群社区是社区建设的方向。

3. 异地养老中各主体究竟应承担哪些责任?

(1)政府的责任。异地养老具有较强的市场属性,政府主要责任并不在于资源投入,而在于规范引导与监督管理。此外,在当下,市场与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特别是影响政府资源投放,总是鼓励政府多花钱,甚至鼓励把资源投放到不该投放的地方。结果在老年服务领域,出现了更多来自于市场的吆喝,政府难免被市场所牵引,结果是方向感的缺失与资源的错配。为此建议政府要特别小心,时刻提醒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而不要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2)养老机构的职责。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应该分属于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范畴。公办养老机构收住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以农村“五保”与城市“三无”为主体的贫困的孤寡、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为其提供无偿或者低偿的服务,代替政府承担“兜底”责任。也就是说,公办养老机构不应介入异地养老的运营,而应该由民办养老机构按照市场的逻辑来提供异地养老所需的产品与服务。

4. 异地养老配套设施几多真实?

由于异地养老对医疗等相关配套设施有更高的要求,然目前的异地养老配套设施多处在“蓝图”阶段。很多养老机构假借医疗机构名义发力,典型的做法是与医疗机构草签一份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就向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与医疗机构合作办养老机构。实际上仔细探究便不难发现,这些场面宏大的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谢幕后,绝大多数便再也没有了下文,因而事实上演变成为市场与地方政府、医疗机构,甚至专家学者联合设计的“迷局”。这样的事例不只出现在养老领域,也出现在其他领域。

5. 异地养老都值得鼓励?

投靠子女,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不仅是人伦的需要,更使家庭照料成为可能,其家庭功能也得以维系,既减轻了家庭的焦虑,也降低了对社会的压力。因此,应取消对老年父母迁徙到子女身边的一切制度性限制,并从养老与医保方面进行制度性变革,使得这些投靠子女的老年人在迁入地享有与当地老年人的同等待遇,使得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变成家庭团聚型本地养老。

至于其他类型的异地养老,不仅可能会增加家庭与国家的负担,更会因此而带来一系列风险。因此,建议国家采取中立的立场,不要直接介入并投放大量的资源于异地养老,而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只需加强对此的监督管理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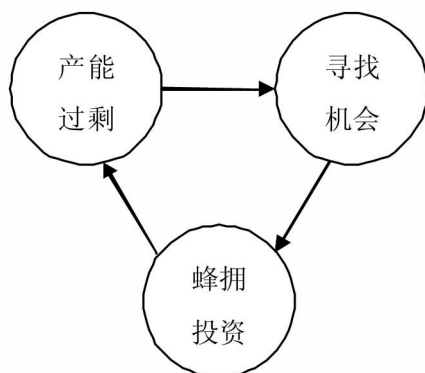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与产能过剩背景下的投资图景

[1]异地养老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要求很高,而中国适合异地养老的地区不多,因而会出现空间上的聚集,海南等少部分地区的部分城市会有更多的机会,而全国其他地区的异地养老机会则很少。

6. 养老地产前景如何？

如前所述，异地养老在中国兴起，并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但这绝不是说一定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虽然异地养老具有小众性特点，但由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小众的生活与消费方式虽然也会给海南等少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城市带来一定的发展机会^[1]。不过，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产能与资本过剩。在产能过剩背景下，资本寻找投资机会，一旦捕捉到投资机会，就会一窝蜂投资，最后导致产能过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以往的异地置业主要是房地产升值的财富效应推动的结果，异地养老因素考虑甚少。如果当异地置业的财富效应衰退甚至消失时，异地置业的投资热情也就大大消退。长期地看，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与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与青岛、南京、杭州与厦门等少数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外，其他城市包括养老地产在内的整个房地产市场会逐渐进入衰退阶段。异地养老项目在中国多是假借养老名义的房地产开发。目前，房地产的财富神话在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正在相继破灭，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开发商编造一些“生动的故事”，甚至不乏道德绑架，目的就是假借“众筹”名义的（非法）集资建房，或者干脆忽悠消费者买房。

7. 异地养老从财富积累开始

尊严不仅有来自于“自尊”，还有来自于“尊他”与相伴而来的“他尊”。尊严不仅与财富的多少密切相关，还与个人的学识涵养等紧密相连，更与民主自由等制度安排密不可分。中国的多数老年人并不富裕，因而有尊严地老去在中国多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如此看来，在中国，财富是保有尊严的物质基础。有钱不一定有尊严，没钱基本上没有尊严，因而财富积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更为重要。因而要有尊严地老去，个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而积累财富从工作第一天开始，理财是每个人一生的事业，而普及经济学常识也成为与普及法律常识、公民教育一样重要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陈标志、党朝峰：《“候鸟人群”增长过快挑战海南社会管理》，〔海口〕《海南特区报》2012年2月6日。
2. 李超：《美国老龄产业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兰州学刊》2015年第4期。
3. 李东、吴定伟：《对广西旅游养老产业发展的思考》，〔南宁〕《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4. 刘伟、陈鹏：《我国异地养老的现状对策研究》，〔南宁〕《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5. 穆光宗：《关于“异地养老”的几点思考》，〔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
6. 王树新：《“异地养老”应自由选择量力而行》，〔北京〕《人口研究》2006年第4期。
7. 阎萍：《异地养老市场分析对策建议》，〔北京〕《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3期。
8. 袁开国、刘莲、邓湘琳：《国外关于异地旅游养老问题研究综述》，〔福州〕《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9. 周刚、周欣雨、梁晶晶：《旅游养老产业化发展初步研究》，〔荆门〕《荆楚学刊》2015年第1期。
10. Krout, John, A. Seasonal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1982(4):266-270.
11. Litwark E, Logino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e Gerontologist, 1987, 25 (3): 266-272.
12. Rodriguez V, Fernandez, Mayoralas. G, Rojo. F. European Retirees on the Costa del Sol: A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1998, 4(2): 183-200.
13. Warnes, A.M. Permanent and Seasonal 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The Prospects for Europe. Netherlands Geographical Studies 1994, 17(3):69-81.

〔责任编辑：方心清〕